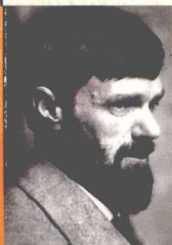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



劳伦斯 中短篇小说多视角研究

○ 汪志勤 ·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

劳伦斯 中短篇小说多视角研究

○ 汪志勤 ·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多视角研究/汪志勤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6

ISBN 978 - 7 - 5473 - 0185 - 2

I. ①劳… II. ①汪… III. ①劳伦斯, D. H. (1885~
1930)-中篇小说-文学研究②劳伦斯,

D. H. (1885~1930)-短篇小说-文学研究IV.

①I561.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617 号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多视角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4. 7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185 - 2

定 价: 30.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两性间的互救 / 15

——《马贩子的女儿》评析

第二章

《太阳》以及太阳崇拜多方位之透视 / 26

第三章

与同性恋、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批评的对抗 / 56

——《狐狸》和《骑马出走的女人》评析

第四章

幽默与反讽 / 91

——《两只蓝鸟》评析

第五章

男性同性关系、阶级和存在 / 106

——多视角透视《普鲁士军官》及其人物关系之多重性

第六章

《菊香》的象征意义及劳伦斯式的自然主义手法 / 124

第七章

两极对照下《公主》的文本建构 / 142

第八章

对话中的独白,抑或独白中的对话 / 159

——《弦外之音》人物声音之评析

第九章

《少女和吉普赛人》 / 177

——劳伦斯后殖民文学的书写

第十章

阶级意识 / 201

——《死去的人》的文本建构中劳伦斯式的贵族观

引用作品 / 216

其他参考文献 / 221

后记 / 226

前言

一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才华横溢的英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画家、思想家和文学艺术评论家,是位多产的作家,终生都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从他191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到1930年3月2日在法国逝世,短短24年中他为世人留下了10多部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数本诗集和散文集、书信集以及多幅绘画作品。他也是其作品在生前和身后都引起极大争议的作家之一。随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相继问世,对他的各类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便先后凸显出五色斑斓的意义。这位充满个性主义、崇尚生命本能的作家和其作品,在如此众多繁杂的批评语境和读者群中自然会遭到褒贬不一甚至截然矛盾的评价和接受。

二

本书为笔者10多年来对劳伦斯中短篇小说研究之结晶,旨在以

各种问题和理论视角多维地来透视、分析和解读劳伦斯 20 多年短暂的小说写作生涯中的这些中短篇作品。对劳伦斯的小说研究,尤其是对其长篇小说的研究,国内外都有数量较大而且涉及面较广的投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术界曾掀起过“劳伦斯研究”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对他的作品的大量译介、评价和研究。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也相继被介绍到国内进入了课堂。因此,对劳伦斯作品评析所依据的理论视角也各不相同:有心理分析的、女性主义的、后殖民的、文化研究的、解构主义的等等。但综观我国文学批评界对劳伦斯作品整体的研究,其对中短篇小说的评析和解读仍缺乏一定的数量和深度。在研究方法上,尽管视角众多,但多数的研究和解读却呈独白性,并有着一种预设的前提。因为研究者往往会采用某一种视角单独地去探讨劳氏独白艺术世界中的某一主题,或是其某篇作品中的某一种倾向和问题。如劳氏之反工业主义、对古希腊多元文化的崇尚、反女性主义、血性意识、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同性恋倾向或对男性身体的崇拜、异性关系和冲突等都会成为某一研究预设的前提。诚然,劳氏的小说创作确实呈独白性,但我们须注意到其文论中的思想所崇尚的却是多元的文化和社会图景。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究其实质就是反对西方柏拉图以降在科学、理性和基督教的桎梏下一元论或两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以及在其钳制下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他的血性意识说、他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对人生于斯的宇宙天体运行之道的理解,所有这些洋洋洒洒地驰骋于他的散文世界中的思想无非就是对人类多元化思维和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但是他的这些思想若进入他的小说创作,进入小说的文本,往往又会成为主宰其主题动机和故事架构的理想。这种劳伦斯式的“理想主义”,尤其是他的生命哲学,往往会竭力抵制他那个年代,尤其是一战后,活跃于西方文坛和思想界的其他思想和声音,如弗洛伊德主义、“迷茫的一代”或“爵士时代(the jazz age)”那颓废消沉的声音。这就使他的小说创作和文本具有独白的和表面上

趋于统一和完成的性质。但经过这些年笔者对劳氏的小说,尤其是其中短篇小说的研究,发现其小说文本中存在着众多“两极之对照”(此系笔者自拟之术语),即互相矛盾的元素,如:耶稣与燔神、理性与非理性、男人与女人、“自然人”和“社会人”、神话与现实、写意与写实、反讽与悲剧等。这些相对照的元素使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及至手法都呈现出现代性。劳氏小说的主题和结构形式虽然在其独白意识的驱使下趋于统一和完成,但他写作中的另一种倾向,即出自他那种独特的自然主义的对人物间或人物与事件的真实关系的尊重,又与其主题动机的独白性形成了两极之对照,使故事文本的意义呈现异质性、多重性并由此产生解读上的开放性。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这一劳氏小说的特性也是其“艺术道德”之使然。^①本书第五章即对他的“普鲁士军官”从男性同性关系或同性恋,阶级、阶级对抗、阶级意识的超脱,存在、存在主义这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批评视角都趋于将文本中的某一问题、某一个点或面视为核心或主题加以阐释,其实这样的核心是不存在的。如引用劳氏著名的天平说,艺术品则永远是美妙地朝着四面八方颤抖着的天平。而文学批评则不应以拇指“残忍地”将天平(或盘秤)按向一方。单一视角的独白性的解读和阐释往往就此粉碎了一件美妙的艺术品中丰富的内含及其思想、诗性和音乐性。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阐释又何尝不是如此。蒋坚霞先生所引用的余光中先生的经验之谈对文学批评的方式不无深刻的启迪:“读译诗……通常的经验是一肚子的闷气,可叹又一篇佳作甚至杰作,平白给人糟蹋掉了。”^②而从某一视角对作品中某一问题终极性的评价也无疑如伸向美妙颤抖着的盘秤的手指,足以破坏我们对作品整体多重性或矛盾性之认识。

当然,笔者无意于解构那些统一于劳氏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但却极想解构盛行于学界或一般读者心灵中的某些定见。如今学人或读者只要触及劳伦斯研究和欣赏,他的“血性意识说”、“反工业主义说”、“男女关系说”等等仿佛都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

莫非劳氏作品的含义真是如此之狭窄？因此本书以集结笔者这些年的研究来多视角地透视劳氏 20 多年写作生涯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揭示他统一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关注中的各种书写使其作品所产生的矛盾的、多重的意义甚或异质性和解读上的开放性。在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劳氏全部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 11 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时，本书还尝试对一篇作品以多视角的透视或多相位的聆听来解构支撑着故事全知叙事的那些坚韧的主题动机，以揭示独白式作品中多重的甚或互相矛盾的意义，即其艺术性之所在。

三

笔者拟将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划分为 1906～1919 年和 1919～1929 年两个时期。1919 年对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可谓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那一年的岁末，他可以说是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故乡英格兰（除了从此直到去世他间或回国小住几次外）。他先后旅居意大利、锡兰、澳大利亚、美国新墨西哥州、墨西哥。最后他于 1925 年回到欧洲，但一直住在意大利，直至 1930 年在法国去世。作如此前期和后十年的划分，便于梳理劳伦斯的整个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历程。自他 1919 年离开祖国开始浪迹天涯的生活，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及创作理念和手法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他这后十年创作的小说文本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仍带有古希腊文化遗迹的意大利（如在短篇小说《太阳》中）以及当时仍存在于新墨西哥和墨西哥的古印第安阿兹台克部落文明（如在短篇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中）在劳伦斯文学创作中刻下的深刻印记。异教（非基督教）文化对劳伦斯的影响，使他对西方的理性和工业文明产生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使他在处理以往所关注的主题上又有了若干崭新的视角。如此的写作语境自然就生成了他那种后殖民文学的书写和对神话手法的诉诸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与当时以及现在女性主义写作和批评的对抗。因此，他最

具争议和现代性的作品乃是这后十年中写成的小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前期的阅读以及欧洲 20 世纪初的新思想和文艺思潮对他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如在他 1913 年写的《普鲁士军官》中我们就已经可以听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生命哲学的声音在作响了。

本书所述及的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共 11 篇,前期的(1906~1919)有《普鲁士军官》(1913)、《菊香》(1909)、《马贩子的女儿》(1916)、《狐狸》(1918);后十年的(1919~1929)有《公主》(1924)、《骑马出走的女人》(1924)、《太阳》(1925)、《少女与吉普赛人》(1926)、《死去的人》(1928)、《两只蓝鸟》(年份不详)和《弦外之音》(年份不详)。但在体例上笔者并不按劳氏作品问世的年代次序,而是按各种问题和论述以及阐释的视角来编排。本书共 10 章(除第三章,因为将《狐狸》和《骑马出走的女人》都放在劳氏的故事文本与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批评的对抗的问题上来论述),每章从某一视角或若干视角来赏析和解读劳伦斯的一篇小说。笔者寄望于通览全书后读者可获得若干赏析和理解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创作之艺术性、艺术旨趣和思想的脉络,因为有些问题本书只是提出了,或论述得较为浅显,如劳伦斯独白性小说中可能存在复调的问题、他的创作与古希腊文化的渊源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他的生命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基督教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相对抗的问题等等。这些隐伏于小说文本中的问题仍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的挖掘。其中有些问题(如古希腊文化渊源),笔者认为,不是一两篇论文或一两个章节就能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予以论述和解决的,此乃需要一两本著作之篇幅。另外,笔者还寄望于此书能给读者了解劳伦斯这前后两大时期主要中短篇作品的创作提供一种纵览,为理解和欣赏这些作品提供若干参考。本书的述及范围基本涵盖了我国比较权威性的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选编和翻译的《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中所收入的 10 篇小说(除《你抚摸了我》和《上尉的布娃娃》之外)。^③

四

将劳氏不同的作品置于各式各样的批评语境中来审视即可揭示其整体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意义上和主题动机上的矛盾性、两重性、模糊性、多重性乃至异质性和阐释上的开放性。我们应竭力避免为某一立论而以某一理论去将他的作品剪裁或描绘成某一批评家所预想的图形和样式,如凯特·米利特在其《性政治》中对劳氏作品根据自己的或某一盛行的社会学理论所作的肆意的削足适履式的描绘。^④某一理论视角只能提供理解作品的一种参照和比较,而非一种宰制。诚然,作品自有适宜其生成的空气和土壤,而这里似乎存在着由理性便可解读之所以然的成分。但是,文学批评应对的是艺术品。“科学的论证”对一件作品、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未免过于冷酷,在其各种角度的论述下,作品也许会呈现为一个在社会学、心理学、某一伦理体系、某一美学体系等意义上的怪物,甚至会被撕成碎片。而这些怪物和碎片如今几乎俯拾即是。报纸期刊不说,每年中那些不得不读的学位论文着实让人五内俱裂。这些学术成果的意义只是在那种永远不变的模式(三分之一的研究背景和理论介绍,三分之二的文本分析)中将艺术品撕成碎片。文学批评似乎已成了一种产业,一种获得学位和晋升的途径,而非对艺术和学术真正的热情和虔诚。每每读起这样的文章,笔者脑海总浮现出杰克·伦敦的那个短语“passionless pursuit of passionless knowledge”。批评家似乎难以将一件作品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待,他们似乎总是刨根问底地以理性去探究其生成过程。艺术品自有其由艺术家在众多美妙的瞬间所挥发出的那些神来之笔的构成。理性无以解读为何这个作曲家或演奏家要如此地(速度上、节奏上、强弱上等)处理这些音符,为何这个画家会如此地处理这个色块与其他色块的关系。而我们却依着某些理论的支撑振振有词地在解读和阐释这一篇篇作品的意义。其结果无

非是一些无稽之谈。艺术品的主题动机可以是独白性的,但对其赏析和阐释却永远都不可能是独白性的。艺术品之奇妙乃是,从某一角度的立论到论证乃至结论这一理性过程根本就无以使我们把握它的哪怕是某一方面的根本意义和真谛。这正如一幅画作,我们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不同的环境色中去欣赏它,即可得到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更不用说不同生活阅历者对它的那些截然不同的评价了。

理解一件艺术品的因人和其他众多因素而异的这一特性揭示了欣赏和解读即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活动或事件,赏析者是在用“心”去体验其精妙和诗性。从中产生的“立论”或问题以及接踵而来的系列性解读和论证势必也具有创意性,虽然研究者无意于把握这作品中“形而上的”终极意义。在看待事物上(宛如一个批评家在审视一件作品),劳伦斯在《艺术与道德》一文中的那句话对艺术批评和解读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为在整个文明的进程中文明人都在强化一种古怪的习惯,到如今他已在这种习惯中麻木不仁了。用这种缓慢地形成的习惯看待事物就好比用照相机。”(劳伦斯 1999: 238)这句话对文学批评和赏析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具有引申的意义。作一不太恰当的比喻,如将某一理论视角视为照相机或其机械性,而艺术品又机械地经由批评者之手透过这一批判体系,这样呈现出来的意义势必是一怪物。难怪乎,在现行的某些对某一作品的评析和阐释的报告和论文中,我们难以感受到按某一理论视角立论和论证的研究在作品中所能感应到的美和诗性。究其根源,这正是由“学者”在长期的学院生涯的熏陶下所产生的麻木感、在科班过程中所培养成的理论视角和成一体系的立论和论证方法所致。他们并不是用“心”去体味作品,而是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去解读和阐释作品。因此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虽然现在也白纸黑字地成了一章一章的独白)不至于将劳伦斯作品中丰富而具多重意义的诗性框定在某一价值模式中。笔者希望这本书只是为文学爱好者或劳伦斯作品热心的读者提供了

某一种理解和赏析上的参照。对作品真正的理解还是要靠个人心灵的感受和体验,而不应受各种批评和理论视角的宰制。各种理论视角的应用乃是参照,甚或权宜之计。研究者想阐明的无非就是作品在这些视角的观照下会呈现出哪些意义和艺术价值以及与其他与之相对抗的解读(如女性主义解读)的意义。

五

劳伦斯的文学书写因为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由早期的注重于人物精微的心理探索的自然主义向后期的诉诸神话等现代主义手法转型,自然就使研究者将各种理论视野纳入其解读和阐释。劳伦斯生于斯长于斯的年代也正逢现代思潮中各种主义风起云涌。他与这些思潮的碰撞、对抗或融合无不体现在他小说的主题动机、人物塑造和关系、叙事手法和策略、情节构成等元素中。本书将着重研究劳伦斯在其小说和文论的文本中所表征的他与这些思潮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尼采、萨特、弗洛伊德、荣格、丹纳、罗素、赫克斯利等人的思想对劳伦斯写作的影响、对抗或融合,对其某种书写形成的催化作用将纳入主要的考证范围。

如劳伦斯后期游历世界各地与异族文化的相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他对西方文化进一步的更为深刻的反思又促使我们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置于后殖民文学批评的语境来审视。对于评析劳伦斯带有后殖民文学书写的作品(如《少女和吉普赛人》),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爱德华·W. 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的某些论述将成为对其作品文本分析重要的参照。

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观照劳伦斯全知叙事下的独白式小说,构成了对其作品赏析上的又一有趣的问题。《弦外之音》这篇以声音命名的小说足以表明劳伦斯无意识中对各个人物声音的关注。而且实际上故事中的四人聚会已摆成了四重奏的架势。声音对此小

说的构成显然已举足轻重,颇具启发意义。对话中的独白抑或独白中的对话、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中的他人意识等问题即形成了对劳伦斯作品独白性和对话性上颇具本质意义的探讨。

从个人的存在和阶级意识的角度来评析劳伦斯的小说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从《普鲁士军官》、《菊香》到《死去的人》,我们可以看出他前期到后期阶级意识的变化。简单地从“矿工的儿子”这一背景来评价体现在他小说文本中的阶级意识显然是目光狭隘和愚蠢之至的。在评价他逐渐形成和变化着的阶级意识方面,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得忽视他母亲莉迪亚·劳伦斯的家庭背景和教养以及她对 D. H. 劳伦斯的期望和影响,以及后者自己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阅读、各种思潮以及他的坎坷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从他与“卑贱者宝贵”这一现实主义原则相对抗的劳伦斯式的自然主义手法这一角度来看,他在后期(如在《死去的人》中)已形成了他自己的(笔者称之为“劳伦斯式的”)与现代工业社会庸俗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抗衡的贵族观。

劳伦斯与当时的心理分析运动和新异教主义的关系,以及体现在他小说中他和荣格的思想中共同的尼采渊源也被作为本书一个重要的文本分析的切入点。荣格对弗洛伊德“赋予无意识以完全个人的特性”的批评和他自己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将被用于对照体现在劳伦斯的短篇小说《太阳》中主人公居里叶的意识状态和超越了自然主义叙述范畴的无意识状态,即荣格所说的超出个人特性的那种“无意识”状态,从而进一步揭示该小说特有的诗性和音乐感以及劳伦斯艺术创作时的狄俄倪索斯状态。

体现在劳伦斯散文中的他的各种思想和文学创作理念也将被用于透视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本书中对有些小说评析切入点将直接采用劳伦斯自己的观点以及创作背景,以揭示其文本中各种元素构成之精妙、其与欧洲文学传统(尤其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他那个时代各种思潮(如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的对抗和融合。如

在对《马贩子的女儿》的赏析中,笔者就以散见于劳伦斯文论中的救世说和血性意识说以及他居住康沃尔时期的那段背景来分析其主题和创作手法,以揭示他笔下梅布尔与乡村医生之间突如其来、情节上看似异常简单,甚至是荒诞的爱情故事的真正用意。

20世纪初也正值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社会和文坛叱咤风云。劳伦斯对一战后新女性的崛起以及其在现代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新型的男女关系的关注即体现在他的散文如《具有公鸡似的信心的女人和具有母鸡似的信心的男人》、《为她树立一种模式》,^⑤和中短篇小说如《狐狸》、《骑马出走的女人》等作品中。他的这种写作态势遭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张挞伐,尤其是凯特·米利特,她在其《性政治》中以批驳劳伦斯的男子至上主义而大肆攻击他的小说创作。为此,本书专辟一章以探讨劳伦斯的艺术创意和思想与女性主义批评之对抗。若从诗学或神话的角度来审视《骑马出走的女人》及其女主人公牺牲的意义,并以此来对比米氏那种“性政治学”的阐释,她所臆造的象征意义之浅薄和荒诞便显而易见了。

劳伦斯的作品素以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严肃地探索而著称,其笔法细腻,对人物及其冲突入微的刻画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严肃而厚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本书通过对短篇小说《两只蓝鸟》的文本分析来揭示劳伦斯作为一个艺术大师风格上的多样性。西方文坛不乏将劳伦斯盖棺定论为“缺乏幽默感”的批评。但是,在他二十年来多产的创作中偶尔确实会冒出些笔调轻松、反讽幽默的作品。李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在《小说家劳伦斯》(*D. H. Lawrence: Novelist*)的序言中首先站出来反驳了T. S. 埃略特之流的批评,并将劳伦斯与历代喜剧大师相提并论:“不管他们有什么理由,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读过这些小说。事实胜于雄辩,劳伦斯无疑名列伟大的喜剧大师之中。”(Leavis 14)而通过对《两只蓝鸟》的细读,我们可以感受到劳伦斯的

书写仍然根植于英国的文学传统。基于他的自然主义手法,他将人物作了较大的夸张和变形处理,从而达到了幽默和反讽的效果,只是在这种喜剧式的轻松诙谐背后依旧隐伏着他对人类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深刻严肃的思考和忧患意识。

劳伦斯极擅长于象征手法。在《菊花的幽香》中,菊花那悲切而悠远但又含混的象征意义贯穿于整个故事,足以让读者迷失在其异质性中。这些象征与主人公在应对丈夫暴亡时表现出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巧妙地糅合在故事的叙事构架中,从而表现出劳伦斯那屡遭非议的自然主义手法。本书围绕“菊香”的象征意义,对比分析了与英国文学传统中的感伤主义相抗衡的劳伦斯的自然主义文艺观和手法。劳氏的这种自然主义手法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非议,有批评家将此归咎于他对“人生怪异而又黑暗的角落和对人性中更为野蛮更为本能方面的关注”。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揭示劳氏敢于触及“人的内心深处那块原始的地方”的意义以及他对“全然的事实”的关注。

六

当然,劳伦斯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作家,其体现在文论中的思想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并不总是表里如一的,这在他后殖民文学的书写中、在他对古希腊多元文化的崇尚与他小说构成上的独白性的矛盾中,是很显然的。因此,笔者在用他的思想来解读他的作品,捍卫他的创作立场之余,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性。如果用荣格的人格面具来类比前者,阿妮玛来类比后者,这两者之矛盾对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小说和散文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如果说后者偏向于理性,前者则更倾向于非理性。在荣格看来,艺术家在创作状态时,他的作品“专横地把自己强加给作者:他的手

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这些作品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形式,他想要增加的任何一点东西都遭到拒绝,而他自己想要拒绝的东西却再次被强加给他”。(荣格 1987: 111)因此,“他只能服从他自己这种显然异己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哪里。他感到他的作品大于自己,它行使着一种不属于他、不能被他掌握的权力,在这里,艺术家并不与创作过程保持一致,他知道他从属于自己的作品……”(荣格 1987: 111)

连艺术家自己都无以认识自己从而把握其作品的构成和一个基本的倾向,批评家就更无以把握其根本的意义了。笔者无意于此宣扬批评之虚无。批评是一种存在。存在或许虚无,或许不虚,因人而异,也是个人的选择。小说家选择了艺术创作,批评家选择了艺术批评。人选择了一种价值也许就不虚无了,尽管我们知道一切都将归于无。但无中又将生有,人生乃至宇宙之万物无不在其中轮回。从有归于寂灭,又从无中生出生命,生出新的选择。有些批评指责某某作家的作品是 heck work。可是,世界上挣钱养家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何他要靠写小说、作诗、画画或作曲来维持生活呢?艺术家的这一选择或许即根源于荣格所说的原型(archetype)。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作了这一选择,如此生成了他的艺术创作。

如是说,批评家的选择也应是原型之使然。但是,他从根本上是热爱艺术,叹服艺术品之伟大和奇妙的。因为,批评家从事的也是创造性的工作。也许,大家都会说这是一句废话。你的文章中若没有创新点,怎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呢?但笔者还是恳请各位读者和批评家注重这一批评工作的创造性和再创造性。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意。对作品欣赏和理解的时刻无不让读者作出选择。某幅画作,即使是某一物品,在某种光线下向观者所凸显的奥义即可类比文学作品的阅读。在一定的历史时刻阅读某部作品,它会向有一定阅历的读者凸显某种意义,并令他采取某一角度去透视其诗性。这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或数种批评视角的选择,它完成了批评家的创意这